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

The Birth, Per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polar System

doi:10.30390/ISC.200604_45(2).0004

問題與研究, 45(2), 2006

Issues & Studies, 45(2), 2006

作者/Author : 陳欣之(Hsin-Chih Chen)

頁數/Page : 111-14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6/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4_45\(2\).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4_45(2).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

陳 欣 之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要

冷戰的終結為兩極體系劃下了休止符，但是國際關係研究對兩極體系結束後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特徵，仍沒有定論。運用「極態」概念解析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面臨權力評量及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存在階級現象的課題。單極體系是描述國際體系內僅有一個強權的國際權力分配狀態，單極體系的獨霸國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其他次級國家力量並不足以挑戰獨霸國所擁有的權力優勢。在單極體系之下，獨霸國以維繫其優勢地位為最大考量，可能會依據挑戰國的存在與否，以及其本身相對他國之權力不對稱差距的小大，產生抗衡、建立國際制度及合作等不同的作為，以求在最佳成本的情況下，滿足其最大利益。其他次級國家的行為僅能從抗衡與扈從中擇一。單極體系的變化有三種可能，分別是從甲國獨霸的單極體系轉換為乙國獨霸的另一個單極體系，以及單極體系會因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性作用而轉換為多極體系，或是轉換為兩極體系。現今的國際體系是一個美國獨霸的單極體系，美國在軍事、經濟、科技創新及國際制度等領域，擁有超出其他主要國家權力的主導地位，更沒有面對其他國家有力的制衡，中共雖被視為美國獨霸地位最可能的挑戰國，不過在一定的時間內，仍未能取代美國在全球的主導性地位。

關鍵詞：單極體系、極態、霸權、權力平衡、扈從、階級

* * *

壹、前 言

歐美發展的國際關係理論，基於其特定的歷史經驗，對於多極與兩極國際體系內的權力分配 (distribution of power) 狀態，以及該等國際體系內的國家行為，曾經有

*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審查意見，他們的寶貴指正，益發增添了本文的學術價值。另外本文的研究成果，得力於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NSC 93-2414-H-006-001) 的支持，謹此一併致謝。



一系列的歸納與論述，對於單極體系的存在，多採取忽視或是全盤否定的態度。^①不過對照東亞地區的國際格局演變過程，可以發現單極的國際權力分配狀態，是東亞國際政治中的常態。中華文明的戰國時代（B.C.403-B.C.221），初期存在七個大國，是典型的多極狀態，歷經200餘年的爭戰，最後由秦國統一天下，形成單極帝國，這段過程是為東亞所熟知的事實。冷戰時代的兩極競爭以美國獨霸收場，至今還沒有發生對抗美國的軍事聯盟，而且美國單邊主義指導下的對外行為，亦沒有受到有力的制衡，甚至有英國、日本等大國尾隨美國的腳步，這些現象成為國際關係理論所急待處理的實務與理論課題。如何修正現行的國際關係理論，以求對當今國際體系作一完善的描述、解釋及可能演變的解讀，將是深化國際關係研究所必須克服的關鍵。

本文將首先運用國際體系的概念，討論國際體系中「極態」（polarity）的界定暨特徵，以及國際體系內的階級（hierarchy）現象。^②爾後從單極體系的結構出發，強調體系對行為者所施加的限制，討論體系內獨霸國行為的可能走向，以及其他次級國家（secondary states）的行為選項；再就單極體系的生成暨轉換的可能變遷進行討論。最後運用單極體系的定義，檢驗當今的國際體系結構，並評述不同論點的理論優缺點。

貳、國際體系極態的界定與特徵

國際的穩定與衝突，長期以來是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問題，結合國際權力分配觀念與國際體系分析方法，形成國際關係中的「極態」分析手段，評量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的集中程度，推斷國際結構的特徵，並且據此探索國際互動與國家行為的根本變化。^③「極態」就是一種國際體系特徵的描述，在某種特定「極態」的國際體系中，由於權力分配方式的不同，亦決定並且造成國家行為的差異。

新現實主義採用體系分析層次，認為國家是國際體系內的單元（unit），無政府狀態（anarchy）為特徵的國際體系結構是最終決定國家行為的變數，國家在體系內能力分配的位置（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決定國家的行為以及其行為結果。

註① 請參考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and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1 (Summer 2000), pp. 5~41.

註② hierarchy 可譯為等級、層級與分級，本文依審查意見，譯為階級。

註③ 早期國際關係學者運用極態概念，主要在討論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的集中程度與戰爭之間的關係，主要論述可參考 Karl W. Deutsch and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Vol. 16, No. 3 (1964), pp. 390~406; Morton A. Kaplan, "Balance of Power, Bipolarity and Other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1, No. 3 (1957), pp. 684~695; R. N. Rosecrance,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the Futur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0, No.3 (1966), pp. 314~327. 運用國際體系的分析層次，討論兩極體系下的穩定狀態及體系內的國家行為，則以華茲 (Kenneth Waltz) 為代表，請參考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果。④故而要討論國家的行為與國際體系，必須要分辨出不同的體系結構；如果要完成確定不同結構的任務，就必須要度量國家的權力（power），以及計算國際體系的「極」（pole）。⑤

國際關係主要以三種方向評量權力，分別是依據對資源的控制、對行為者的控制以及對於事件及結果的控制，來判定國家所擁有的權力。⑥對資源的控制能力，諸如軍事支出數額、軍隊的規模、國內生產毛額、人口、領土等各種物質指標，是最常用來評量國家權力的方式。不過運用物質資源計算國家權力的方式，具有某些缺點，首先是吾人很難確定行為者能夠使用這些資源，相對豐碩的資源與能力，並不見得會轉化為等量的權力；再者，在計算國家整體權力時，何種資源能力應被納入計算而且不同項目之間的分配權重如何，亦很難確定；第三，某些資源很難被精確地計算，例如國家軍事力量的評估就很不容易；第四，計算資源能力的國家權力評量方法，排除了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活動中的作用。⑦排比國家控制資源的多寡，不得不面臨資源數量與實際權力之間的差距問題，凡此都增加評估權力分配情況或是權力集中程度的困難。而且自九一一恐怖事件後，非國家行為者與國家間的互動成一個新的課題，以計算擁有資源的多寡來衡量權力，僅能適用於國家這個行為者，將不能衡量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及行為。

國際互賴現象強烈的全球化時代，依據對其他行為者行為的控制程度或是對事件結果的控制能力來計算權力，似乎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因為它顯示國家決定事態走向與滿足本身目標的程度，也就是依據國家施展權力的效果，來估量國家權力的高低。不過這種評量權力的方式，牽涉到資源如何轉化為有效手段，其他行為者如何被影響改變其原有目標，以及事件結局是否符合國家期待目標的問題。如果採用這種估算方式去評量權力，就必須討論施展權力的社會化作用，而將權力定義為在社會關係下，行為者形塑其能力並且決定其命運效果的產物，⑧不可避免地要討論國家與國家間的社會化作用，以及國際社會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採用這種方式評量權力，計算國際體系權力與決定權力分配狀態，將面臨量化的困難。如果依據事件及結果的控制程度來決定國際社會中的權力位階，或許可以針對某一特定事件作樣本，評斷強權國家能否克服其他國家的反對，並且實現其國家目標的程度，例如美國在2003年不顧國際輿論攻打伊拉克的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不過以事件及結果來評量權力，卻僅能在事件或結果發生後判定某國的權力高低，因而產生「事後諸葛」的缺憾。依循過去歷史事件來判定的權力高低，能否解讀為當前或是未來國家所擁有的權力，其適用性

註④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7.

註⑤ *Ibid.*, p. 129.

註⑥ Jeffrey Hart,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2 (Spring 1976), pp. 289~305.

註⑦ *Ibid.*, p. 290.

註⑧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Winter 2005), p. 45.

頗有疑慮，能否據此建立國家行為的因果關係法則，亦有待驗證。

討論國家權力時，更應注意權力的範圍與領域（scope and domain），否則常會陷入權力無用論或是權力資源轉換性被誇大的困境。^⑨故而在運用權力概念來評估國際體系的「極態」時，應注意此時權力所適用的領域，乃是有關於安全暨生存的範疇，是討論國家在國際體系內的權力分配位置，對攸關國家生存事項等行為之影響。採用「極態」的分析手法去描述、解釋暨預測國家行為時，國家是處於一個競爭性的國際體系環境中，而權力是作為一種維持國家生存暨地位的一種手段；權力分配的狀態，影響了處於特定權力分配位置之國家的行為。有鑑於此，本文以軍事能力來界定權力，因為武力是國際政治的最終比價標準（ultima ratio）。^⑩

確定「極態」時，更觸及國際關係的另一個挑戰，也就是國際體系中的階級現象。^⑪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作用，並不重視國際關係中的階級現象，^⑫但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相對國家間仍有可能發生階級現象。^⑬新現實主義以體系內權力集中於一國、兩國或多國的方法，作為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指標，同時亦暗示國際體系內的行為者之間存在權力的階級面貌，因為很明顯地，強權國家的地位及所掌握的資源，遠遠超出大部份的一般小國。雷克（David A. Lake）就指出，階級一直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從古早的帝國到十九世紀殖民地的存在，國際關係中的階級現象十分明顯。^⑭階級現象不單是相對國家間掌握權力資源高低所形成的等級，更代表了強權國家對弱勢國家所擁有的權力作用；而且此種權力的支配作用，會

註⑨ David A. Baldwin,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2 (January 1979), p. 173.

註⑩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6. 有關麥斯海默運用軍事武力而非經濟指標及結果論來評估權力的理由，請參考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ter 3.

註⑪ 有關國際體系中階級現象的討論，請參考 Takashi Inguchi and Paul Bacon, "Empire, Hierarchy, and Hegemony: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5, No. 2 (2005), pp. 117~132; John M. Hobson and J.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1 (2005), pp. 63~98; Tim Dunne,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2003), pp. 303~320; David A.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1(1996), pp.1~33; David A. Lake,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3 (2003), pp. 303~323;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4 (1995), pp. 689~721; William C. Wohlforth, "Hierarchy, Status and War," paper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Ma., 2002.

註⑫ 新現實主義宗師華茲曾對無政府狀態及階級現象作一討論，不過並不以為階級現象可以作用建構國際關係簡約化理論的基礎，請參考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4~116.

註⑬ David A.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 footnote 19.

註⑭ David A. Lake,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04.

因為彼此關係的制度化，而具備權威的正當性。^⑯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更推翻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無政府狀態與國家中心主義，強調新現實主義認定國際體系結構時，僅關注軍事政治領域，忽略了經濟領域與社會文化領域，進而忽視了國際體系從無政府狀態轉向階級狀態，而且又從階級狀轉換為無政府狀態的歷史事實。^⑰

表一 國關理論對結構與階級的觀點

	國際體系之特徵	國際體系之變化	對國際結構與階級現象的討論			
			國際結構的形式	國際結構的穩定性	階級的形式	階級現象的持續性
新現實主義	無政府狀態	權力分配集中程度的改變（極態）	多極	不穩定	無明確討論	很低
			兩極	權力平衡帶來的穩定很高	無明確討論	很低
			單極	權力集中帶來的穩定很高	階級存在於無政府狀態內，討論新帝國的形式	爭論中
霸權轉移論 (吉爾平)	無政府狀態	霸權的更迭	霸權與挑戰國的競爭(能力超越對手之程度)	國際制度的創建與國際合作帶來穩定，間或發生霸權戰爭	暗示無政府狀態下的階級，霸權領導	很高
權力轉移論	階級狀態	主宰國的轉移	階級之持續	結構內主宰國的更迭造成穩定的波動	未明確討論階級的形式	在國際體系中長期持續
英國學派	無政府狀態與階級狀態，在世界歷史中轉換	軍事政治領域、經濟領域與社會文化領域中的變化均不可偏廢	國家與國際體系間的互動與過程，均成為構成國際體系的重要因素	國家類型的變化導致結構的轉換	帝國	在某些歷史過程中持續很久

資料來源：整理自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Ronald L. Tamm,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註^⑯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p. 690.

註^⑰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84.

權力轉移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曾對國際體系中掌握權力資源高低而形成的階級現象有初步的分析。權力轉移論以為，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是不均等的，而且權力集中於少數國家的手中，故而國家間權力分配的差距，造成國際體系的階級現象。^⑯在一個階級的國際體系中，位居權力分配金字塔頂端的是主宰國（dominant nation），它擁有國際體系內最大部份的資源，維持相對於潛在對手的權力優勢，以及運用可造福盟國並滿足其他傾慕國的規則，管理國際體系體系，以長保其權力的優勢地位，不過主宰國不能單向地控制其他強國的行為。^⑰霸權轉移論（Hegemonic Transition Theory）的健將吉爾平（Robert Gilpin），^⑱亦曾以霸權體系（hegemonic system）描述國際體系的階級狀態，他認為在霸權體系中，僅有一個最強大的國家控制著體系內的其他次級國家，^⑲不過吉爾平亦沒有對這種階級現象作出更精確的解釋及描述。

階級現象意謂相對國家間存在的從屬及支配性權威關係。相對國家間在安全互動中存在階級關係時，主宰的一方固然擁有相對的權力優勢，主宰國家更會運用其權力去操縱從屬國（subordinate），故而從屬國不單是失去了自主（autonomy），更失去了自主的權利（right to autonomy）。^⑳所以國家間的階級關係並不一定會出現大國軍事干預從屬國的現象，相反地，經由主宰國與從屬國之間的制度性安排，例如主宰國與從屬國之間，透過條約、規範及共享意識形態所展示出十分穩定的相互主觀諒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s），確定了彼此的行為期待；^㉑透過國家安全事務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制度化，產生了安全的功能性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這種安全分工並不僅只於兩造對安全的內容款目（provision）之分工，更因為主宰國決定何者是從屬國的安全威脅，主導了從屬國的安全認知，使得從屬國依附於主宰國，而且受到主宰國的影響。^㉒所以主宰國與從屬國之間的階級關係，產

註^⑯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6; and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172.

註^⑰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6.

註^⑲ 吉爾平提出的霸權轉移論，主要在討論霸權的興衰因素及霸權間的轉移現象，請參考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霸權穩定論的關注焦點在於霸權在組建國際經貿及金融等各種國際制度或是國際建制所發揮的領導作用，以及霸權對於國際制度或是國際建制之維繫所產生的決定性角色，請參考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 131~162;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㉑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29.

註^㉒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p. 697.

註^㉓ *Ibid.*

註^㉔ *Ibid.*, p. 698.

生了賦予主宰國支配從屬國的正當性權威。^㉙

從國際關係對權力的認識及國際體系中的階級現象出發，判定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狀態，並據此決定國際體系的「極」，雖是衆人的共識，但是如何計算與判定，卻並沒有一定方法。華茲認為依據常識（common sense）就可以判定，^㉚但其他學者有不同的計算方式。目前至少有三種方法判定國際體系中的「極態」。第一種判定方法，是計算體系內強權國家的數目：計算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情況是集中於多少數目的強權國家，以判別國際體系是多極、兩極或是單極體系。^㉛第二種方法以國際間聯盟的數目來決定國際體系中的「極態」：如果有兩個聯盟，則此種國際體系是兩極體系；^㉜不過這種計算方法引發不同的爭議，例如華茲就不表贊同，他認為如果國際體系中有三個以上的強權，不過形成兩個不同的聯盟，仍然是一個多極體系，因為所謂的兩極體系，是國際中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挑戰兩極的強權。^㉝最終一種方法是評量權力分配情況的特徵面貌：^㉞例如卡普蘭（Morton A. Kaplan）將國際體系分類為權力平衡體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鬆散兩極體系（loose bipolar system）、緊密兩極體系（tight bipolar system）、全球體系（universal system）、階級體系（hierarchial system）與單位否決體系（unit veto system）等。^㉟本文以計算強權國家的數目，來決定國際體系中的「極態」。

對於兩極及多極的國際體系，國際政治學者已有相當的論述，不過對於單極體系的定義，仍然沒有定見。克普強（Charles A. Kupchan）認為，國際體系中單一國家較其他國家擁有為數眾多的財富（wealth）與軍事力量，該國際體系就是單極體系。^㉟萊恩（Christophe Layne）定義單極體系是國際體系中的單一強權具有壓倒性的地緣政治優勢，其能力已龐大到足以排除他國組成任何壓制性的制衡聯盟。^㉚伍佛斯（William C. Wohlforth）強調單極是一種國際結構，單極體系意謂國際體系中單一國

註㉙ Ibid., p. 690, 700.

註㉚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31.

註㉛ 請參考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註㉜ Robert M. Haas, "International Subsystems: Stability and Pol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1 (1970), pp. 98~123.

註㉝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8.

註㉟ Frank W. Wayman, "Bipolarity and War: The Role of Capability Concentration and Alliance Patterns among Major Powers, 1816-196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1 (1984), pp. 61~78.

註㉟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7), pp. 21~53.

註㉚ Charles A. Kupchan, *The End of American Era: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註㉚ Christophe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p. 5~51.

家的能力已大到無法抗衡的程度，^⑩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有能力挑戰此一獨霸國家的優勢地位。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在單極體系下，超級強權能夠單獨而且有效地解決重大的國際問題，其他國家的總合並不能夠阻止超級強權的為所欲為；單極體系應是只有一個超級強權（superpower），沒有重要的主要強權（major powers）。^⑪不過他沒有說明超級強權與主要強權的差異為何，以及如何評量權力分配的比例來決定強權國家，亦沒有強調霸權國家的不可挑戰性，而是專注於霸權國的政策達成性。

總括而言，單極體系是描述國際體系內僅有一個強權的國際權力分配狀態，單極體系的獨霸國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其次級國家力量並不足以挑戰獨霸國所擁有的權力優勢，故而單極體系是一種極端不對稱的國際權力金字塔階級結構。由此出發，單極體系有三項特徵，首先，單極體系內只有一個強權國家，其特徵是獨霸國擁有極大的相對權力資源，這種資源的主要指標是軍事力量。大部份學者依據控制資源能力所定義的權力，來評估國際體系內權力的分配狀態。麥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強調評估國際體系內國家權力的唯一指標應該是軍事力量，^⑫並且認為權力不應與結果劃上等號，因為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作為一種手段的權力，如何影響政治結局。^⑬他指出，如果某國在實質上比體系內的其他強權更有權力，並不算是獨霸國，因為它還面對其他強權。^⑭不過麥斯海默卻又認為獨霸國在單極體系內應支配其他所有國家，暗示如果擁有壓倒性的權力，將會擁有高度而且不可動搖的支配性效果。但是擁有優勢的權力資源及能夠為所欲為，並不代表獨霸國將排拒妥協的折衷方式，毫無節制地採用單邊主義「以力服人」宰制全球；相反地，若獨霸國採取戰略節制（strategic restraint）態度，可能會更長久而且有效地統御全球。^⑮例如美國當前運用多邊方法處理北韓暨伊朗可能發展核武的方式，未必代表美國並未擁有全球絕大部份的相對權力資源。

其次，單極體系內次級國家的軍事力量，無力挑戰獨霸國所擁有的壓倒性軍事優勢，獨霸國在軍事領域具有不可挑戰性。由於「極態」定義下的國際體系是討論國家生存競爭中的行為，所以軍事力量是國家在進行極致的生存與國際地位之競爭中，最有力的手段。從蘇聯退出冷戰導致兩極體系結束的事例中可以發現，內部經濟崩潰使得投注在軍事領域的資源無以為繼，被迫退出國際生存競賽的第一線，是一個強權國家不再被視為「一極」的重要指標。不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絕不具備在國際競爭中

註^⑩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 9.

註^⑪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1999), p. 35.

註^⑫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ter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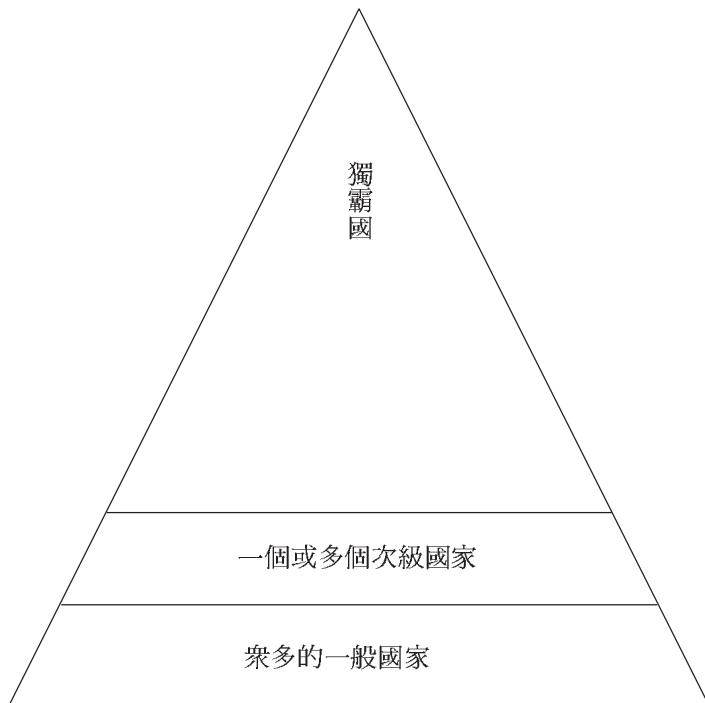
註^⑬ *Ibid.*, p. 60.

註^⑭ *Ibid.*, p. 40.

註^⑮ John G.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1999), pp. 56~58.

勝出的可能。無論是兩極強權或單極獨霸國，都具備其他國家所難望其項背的軍事力量；而且這些被稱為「極」的強權國家，都具備在軍事領域的不可挑戰性。

圖一 單極體系的權力分配階級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最後，單極體系呈現金字塔狀的全球權力分配格局，具有權力分配極端不對稱的特徵。單極體系內的獨霸國單獨處於國際權力分配的最頂端，沒有其他可能競爭者能與其匹敵，並且掌控優勢的權力資源。權力遠遜於獨霸國的次級國家組成第二級，它們的數目或多或少，亦擁有不少的權力資源，不過其權力卻遠遜於獨霸國，更無力挑戰獨霸國的優勢獨霸地位。組成單極體系最低層的是一般國家，它們的數目衆多，不過所擁有權力卻十分有限。（如圖一所示）

參、單極體系內國家的行為

單極體系現象並不令人陌生，例如中華帝國、羅馬帝國與拿破崙法國等，就今日的角度觀察，這些單極體系不過是區域性的單極體系，不過就當時的時空環境及國際認知，這些國家已是征服「天下」的全球性單極體系獨霸國，所以參照往昔中華帝國等單極體系所呈現出的國家行為，足以成為討論今日全球性單極體系的重要例證。單

極體系下，獨霸國與其他次級國家的行為，將會有明顯而且劇烈的差異。獨霸國傾向維持其優勢的地位與體系內權力分配的現狀，但是其他未能挑戰獨霸國地位的次級國家，可能不得不運用「扈從」（bandwagon）政策。若次級國家採行「抗衡」（balance）獨霸國的策略，則必須打破單極體系內相對權力集中於獨霸國的結構，對次級國家而言，必然會招致獨霸國的反制措施，而且其付出的成本會十分高昂。

單極體系內，由於權力集中於單一國家，故而位於權力分配金字塔最頂端的獨霸國，相對於體系內的其他成員，將會擁有最大的自由行為空間。^⑨在已經取得國際體系中相對優勢的地位之後，獨霸國目標將是長久地維持此種相對的優勢地位，^⑩並且防止國際上出現任何的改變現狀國家（revisionist state），威脅獨霸國的國際地位與權力分配的最高位階。

獨霸國相對他國的權力不對稱差距高低，以及是否存在潛在的改變現狀挑戰者，都影響單極體系獨霸國的行為。獨霸國相對次級國家所享有的權力優勢差距，是影響獨霸國行為的第一個變數。兩極體系或是多極體系中，強權國家都會受到其他對手國的牽制與挑戰，威脅著本國的生存、安全與地位。不過在單極體系內，獨霸國掌握著大部份的權力，享有不對稱的權力優勢，其他體系內的行為者均不能構成生存、安全與地位的威脅與挑戰，所以相對於兩極體系或是多極體系的強權，獨霸國幾乎享受更多而且更大的行為餘裕。這些行為餘裕的高低，與獨霸國相對於次級國家間的權力不對稱差距情況有極大關連。如果此種不對稱差距愈大，獨霸國所受的行為拘束就愈小；反之，獨霸國的行為自由度會受到更大限制。

另外一個影響獨霸國行為的因素，取決於是否存在一個改變現狀的挑戰國。國際體系中如果有任何一國或是一個國家的集團，採取措施，而且其目標是取代獨霸國的地位，改變國際權力分配的狀況，重新塑造國際秩序，如此將成為一個改變現狀國家。基於維持現狀的考慮，獨霸國必須回應改變現狀國施加的挑戰。其他國家改變單極體系的意圖與行為，是否會構成獨霸國地位的威脅，將引發獨霸國不同程度的回應。

依據相對權力不對稱差距的小大，與改變現狀挑戰國的存在與否，獨霸國在不同的組合情況之下，會有不同的行為（請參考表二）。

首先，在單極霸權國享有高度不對稱權力優勢的情況下，如果存在潛在的改變現狀國家，獨霸國將可能採行征服的措施，直接地採用武力，消除改變現狀國家的可能威脅。十九世紀初葉拿破崙帝國時期，拿破崙在歐洲建立一個單極獨霸的國際體系；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面對企圖改變體系面貌的英國、俄國及奧國，均採用征服的作為，毫不猶豫地採行對抗性軍事行動，剷除周邊任何企圖改變法國優勢地位的挑戰，並且取得勝利。中國漢朝的軍事力量逐漸上升後，就對北方的匈奴開展征伐，消除心頭大患。

註⑨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 29.

註⑩ Michale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51~52.

如果在單極體系內不存在任何的改變現狀國家，而且體系內不對稱權力差距又極大，獨霸國將力圖維持在體系權力分配的最佳優勢地位，建立維持其利益的國際制度，防阻任何國家取得相對的權力成長機會，維持獨霸國的長期優勢。例如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的中華帝國，是東亞區域單極體系的獨霸國，在當時的日本、朝鮮、安南與中亞諸邦都沒有能力與意圖改變當時權力分配現狀的情況下，清代精進朝貢制度，利用貿易利益的誘因，維持各國對中國獨大政治地位的順從。羅馬帝國建立橫跨歐、亞、非洲的單極帝國後，羅馬的政治、文化暨經貿活動，在羅馬帝國的武力保障下取得快速地進展，更鞏固了羅馬帝國的優勢統治地位。拿破崙帝國在建立歐陸的優勢後，亦透過分封王室的方式，強化拿破崙法國對歐陸的控制。

表二 單極體系內獨霸國的可能行為

		潛在改變現狀國家	
		存在	不存在
不對稱權力差距	大	征服	建立制度
	小	圍堵、預防性戰爭	制度下的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倘若獨霸國掌握國際權力的份量正面臨逐步下滑的趨勢，獨霸國的相對權力不對稱差距開始縮減，而且國際體系內又興起改變現狀國家，獨霸國可能會採用圍堵等抗衡（balancing）策略。有鑑於獨霸國相對於崛起強權的軍事力量衰敗，而且此種軍事衰敗可能削弱獨霸國的討價還價地位（bargaining position），甚至帶動政治、經濟、文化及他種與現狀相關的利益，獨霸國會面臨戰爭及犧牲國家重大利益的抉擇，故而有很高的動機採取發動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的方式，防阻改變現狀國家的持續坐大。^④二次大戰結束初期的美國，亦是處於單極霸權的最佳狀態，不過當時蘇聯逐漸挑戰美國的單極地位，尤其是 1949 年蘇聯試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所擁有的核武優勢後，處於權力地位上昇趨勢的美國，就展開了圍堵的作為，但也因為蘇聯軍事力量的急速上升，亦使當時的國際格局從短暫的單極階段轉變為兩極對抗。現今的美國，面對中國大陸在經濟與軍事領域的持續成長，正被迫結合日本、印度等國，事先壓制中共可能改變現狀的企圖。

如果體系內不存在任何意圖改變權力分配態勢的改變現狀國家，而且相對權力不對稱情況又逐漸不利於獨霸國，單極體系獨霸國將傾向採取多邊國際合作的作為，力圖維持獨霸國在國際制度的運作中，所具備的不可或缺主控地位。獨霸國會建立提供

註④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 (1987), p. 87; Steve Chan,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3 (Spring 2004), p.14.

資訊的多邊制度，得到更多有關利益、偏好及其他國家意圖的資訊。^②這種多邊的安全與經貿制度，得以提供不同政策選項的成本效益，進而影響政策的選項，改變國家手中擁有的權力資源之強度，並且影響主宰制度運作的規範。^③經由制度的作用，單極體系的獨霸國，不但可以維持單極體系的秩序與穩定，還可以長期確保本國在權力分配的優勢地位，更可以降低決策時的不確定性。其他次級國家將難以割捨現行制度所帶來的各國利益，在沒有更大的利益可供選擇的情況下，仍會傾向支持獨霸國在國際制度中的領導地位。

清代中葉後，雖然滿洲政權已呈現頽勢，不過朝貢體系仍為東亞諸國所樂意接受，並沒有改意的意圖。此外美國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時代，美國強化全球經貿制度，從原有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擴展至「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這些有利於美國獨霸秩序的國際制度，在運作暨拓展中，提升了制度的公平性及正當性（legitimacy），更與其他滋生的相關制度，組成一個相互連結與互賴的網絡，產生了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的效應。^④一則促使其他國家爭相加入這些國際制度，二則使得可能替代現有制度的潛在制度，相對具有更高的創建成本，很難取得競爭與成功的機會；即使原有國際制度內的參與國對單極體系獨霸國的作為有所抱怨，亦因為報酬遞增的效果，被迫接受現有的制度運作，而不會去撕裂獨霸國主導的國際制度。^⑤運用國際制度所產生的報酬遞增效果，將可以更有效地鞏固獨霸國的原有國際政經地位。

相較之下，單極體系內的次級國家，其行為選項與決策空間，受到更多單極體系結構的拘束與限制，最終被壓縮到抗衡與扈從兩種選項。其主要原因，在於次級國家擁有的權力不足以抗拒獨霸國的壓倒性優勢，而且抗衡策略會導致本國生存與安全的高度危險，迫使次級國家不得不暫時屈服在獨霸國的威嚇之下。

依據權力平衡理論，抗衡是單極體系內必然發生的現象。^⑥權力平衡理論認為，抗衡意謂透過本國內部實力的增長或是結合其他相對弱小的國家，共同組成聯盟對抗體系內最強大的國家，因為較強大的國家對次級國家的威脅較大，所以次級國家會群聚於弱國的陣營。^⑦因此國家威脅的認定完全是依據權力的大小程度，小國必然會疑懼大國的行為與相對優勢的能力，進而會採取增加本國實力的方法，或是與其他弱小

註^② Helega Haftendorf, et al. ed.,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4.

註^③ *Ibid.*, p. 4.

註^④ John G.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73. 報酬遞增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有關此一概念在政治學的運用及探索，請參考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2000), pp. 251~267.

註^⑤ John G.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pp. 71~76.

註^⑥ Christophe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and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註^⑦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7.

國家組織成一個有形或是無形的聯盟，共同抗衡單極體系內的獨霸國。^⑧

不過權力平衡理論在適用於單極體系時，涉及一個相對力量大小程度及其作用的問題。權力平衡理論的前提是，弱國運用內在及外在方式增長權力的作為，會導致弱國集合的權力大於或是等於獨霸國的權力，暗示弱國的結合必然會組成一個大於獨霸國整體能力的權力基礎，而且聯盟可以運用此種權力集合，去對抗獨霸國所擁有的權力。再者，華茲的權力平衡理論認為，權力的相對差距是啟動抗衡政策的唯一變數，相對權力弱小的國家或集團，必然會運用抗衡政策去對抗相對權力較大的國家或集團，這種動因，完全不受意識形態與觀念等因素的影響。^⑨此外，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提出了另一種抗衡政策啟動的原因，認為抗衡政策的動因來自於威脅，如果一個國家被視為具有威脅性，會引發他國採用抗衡政策對付此國，^⑩威脅性的認定來自於具有敵意、具有攻擊性武力、或是擁有相對能力及地理鄰近位置的國家。^⑪

不過，倘若次級國家所組成的聯盟權力總和未能超越獨霸國的權力，或是次級國家沒有感受到獨霸國所施加的威脅，抗衡政策是否仍為次級國家面對獨霸國的唯一政策選項，顯然有待商榷。採用扈從政策，可能會是單極體系內次級國家所不得不然的行為。橫跨東亞的歷史，朝鮮、安南與緬甸並沒有結成聯盟去抗衡中國。回顧美國成為區域霸權的過程，加拿大與墨西哥亦沒有結成軍事同盟去抗拒美國的優勢地位，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根本不構成獨霸國的潛在競爭者與挑戰者。^⑫

扈從政策意謂弱國加入強者的陣營，^⑬或是某國加入造成其威脅的國家與陣營。^⑭瓦特（Stephen M. Walt）認為扈從是一種不對等的交換，弱國對主宰國作出不對稱的讓步，並且接受一個臣服的角色，扈從表示一種意願，支持或是容忍主宰性盟邦所為的不正當行為。^⑮華茲認為體系中的弱國不可能會採用扈從政策，因為體系中國家的最大考量不是尋求權力的最大化，而是維持生存與安全，以及維持國家在體系內的地位。^⑯華茲舉出扈從政策的最大缺點，在於此種政策完全不能保障弱國的生存安全，

^{註⑧}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 28.

^{註⑨}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7.

^{註⑩}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

^{註⑪} *Ibid.*, p. 5.

^{註⑫}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36; David C.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Winter 2003/04), pp. 165~180.

^{註⑬}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註⑭}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p. 17.

^{註⑮}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in Southwest Asia: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Cold War Competition,”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5.

^{註⑯}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因為弱國選擇加入強者的陣營，一旦擊敗另一敵對陣營後，強者便可定奪同一陣營內弱國的生死，故而弱國不會採行扈從政策，而會運用加入弱者陣營的抗衡政策，從而確保本國的生存與安全。^⑦華茲的論述是觀察多極與兩極國際體系中所得到的結論，但是在權力極端不對稱的單極體系中，國家是否會採用權力平衡策略來保障國家的生存，顯然是另外一番光景。

單極體系內最大的特徵，在於權力分配狀態是相對權力集中於獨霸國一身，其他次級國家，無論是個別或是集體，處在權力極端不對稱的相對劣勢，都不擁有足以抗衡獨霸國的能力。組成聯盟抗衡極體系內的獨霸國，其成本過於高昂，而且沒有成功的把握，反而會因為組織聯盟的動作，招致獨霸國的可能反制行為；所以單極體系內的次級國家，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只有採取扈從政策，或是不採取任何行動，以免招致獨霸國的敵意。^⑧二次大戰時期的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在無力抗拒納粹德國的軍事威勢下，選擇加入德國陣營；墨西哥在屢次成為美國擴張的祭品後，亦不再抗衡美國。

單極體系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國際體系內的相對權力分配集中於單一國家，其他次級國家不僅個別地未能與獨霸國抗衡，甚至組成聯盟後的整體能力，亦未必能與獨霸國相敵。故而單極體系這種權力極端不對稱的狀態，限制體系內所有次級國家的行為選項。單極體系內的次級國家，或是必須採用扈從政策，或是被迫默許獨霸國的行為，即使這些獨霸國的行為不具有任何正當性，或是會傷害到本國或是他國的權益，因為任何不符合成本的行為，都可能會傷害次級國家的生存與安全。單極體系亦對體系內獨霸國的行為形成約束，在維持獨霸國安全與生存的目標之下，獨霸國必須維持其優勢的相對權力分配地位，因為任何本國優勢地位的負面變化，都會傷害到獨霸國的生存、安全、威望與利益。在獨霸國採行種種行為時，體系內是否存在改變現狀國家，以及獨霸國本身相對掌控權力資源的趨勢，都會左右獨霸國所採用的行為與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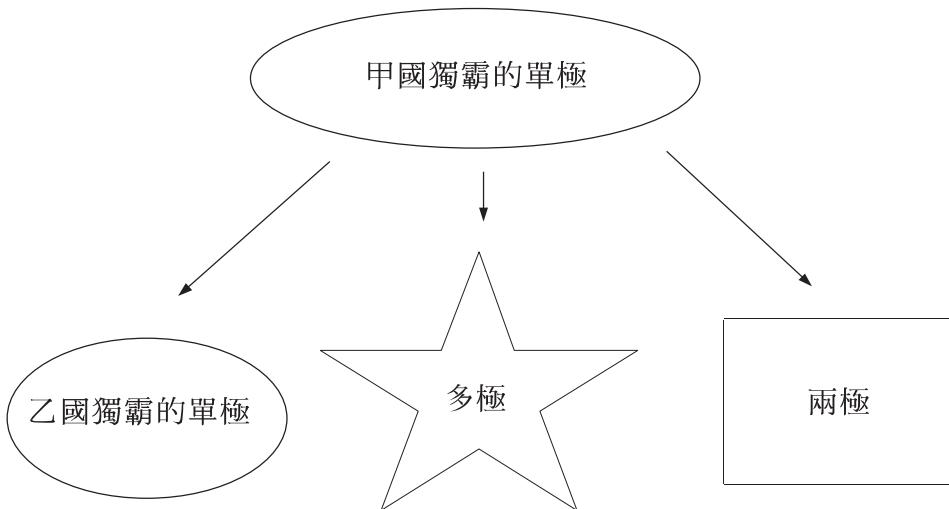
肆、單極體系的生成與轉換

單極體系並不是國際體系中的特例，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曾發生過多起單一國家擁有體系內大部份相對權力的情況。這些單極體系最終趨於消失，主要的原因，或是其他國家的抗衡政策，或是本國的衰敗，或是獨霸國無力因應來自於體系外在的挑戰。故而單極體系一如其他的各種國際體系，一旦體系內權力分配的情況發生劇烈改變，單極體系就會產生轉變，形成多極或是兩極的國際體系，甚至不能排除新興單極霸權國取代舊有單極霸權國的可能（請參考圖二）。

註^⑦ *Ibid.*

註^⑧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 24~25.

圖二 單極體系的可能轉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單極體系常發生於區域性的國際結構，不過全球性的單極體系能否產生，則有不同的看法。發生在東亞的中華帝國雖然鼎興不斷，中國皇朝主宰東亞國際局面的現象，被稱為「朝貢體系」（tributary system），^⑨是歷史上最悠久的單極體系。在華夏文明區域，即使曾發生「合久必分」的多極體系，不過大一統的思維一再促使單極體系的再生。^⑩朝鮮與安南等國，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雖然曾不時發生叛亂，但始終沒有發生改變東亞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西方的羅馬帝國統治時期，法國路易十四皇朝與法國的拿破崙時期，是曾發生於西歐世界所認知的單極體系；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與十五世紀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則是西方世界體系認知外的例證。^⑪不過這些單極體系，並未發展為一個全球性的單極獨霸格局，而是侷限於一定的地理環境之內。例如東亞中華單極體系的崩解，不是由於體系內其他次級國家所組成的抗衡聯盟，而是來自於西歐多極國際體系中的一股力量，對東亞中華單極體系施加額外的壓力與挑戰，打破中華帝國在東亞地區的優勢地位，更將所有東亞國家納入其權力的影響力之下。區域性的單極體系獨霸國，都是依仗著強大的武力，威嚇區域內的其他國家臣服在獨霸國的支配下，甚至採用征服的手段，將他國的領土直接納入區域單極體系獨

^⑨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⑩ 中華文明中大一統導致穩定的思路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例如孟子見梁襄王時，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說：「定於一」，請參考孟子，孟子，梁惠王篇上。

^⑪ David Wilkinson, "Unipolarity Without Hegemony,"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2 (1999), pp. 145~151.

霸國的直接統治。

單極體系的第一種轉換可能，是從甲國獨霸的單極體系轉換為乙國獨霸的另一個單極體系，如同權力轉移論與吉爾平的論述，舊霸權面對不可避免的衰敗，在歷經霸權戰爭後，為新霸權所取代；而且這種取代發生的主要根源，不能忽略來自於國家的內部因素，也就是原有獨霸國因為內部因素所造成的衰退，以及新興替代獨霸國的高度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權力優勢。^②

大部份的新現實主義論著，則對單極體系的產生，抱持著另一種完全極端的看法，認為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作用，會限制全球性單極體系的生成，否定單極體系的生成可能與體系延續性。新現實主義從體系的分析層次出發，認為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結構會導致平衡作用（balancing）及相似性（sameness）。這兩種結構性作用，會防阻或是結束單極體系現象，即使短暫地發生權力分配大部份集中於一國的現象，遲早會轉換為多極體系，^③也就是單極體系的持續性很弱，而且曇花一現的單極體系，會轉換為多極體系。

新現實主義的學者從國際無政府狀態結構的論點出發以為，首先，國際結構會產生權力平衡作用，終結單極體系的不對稱權力分配情況。由於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與面對自助（self-help）的壓力，安全及生存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所有國家都擔心他國會運用相對增加的能力危害本國，更關注本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地位，因為相對權力的改變可能導致嚴重的安全威脅。^④由於單極體系的權力分配極端不平衡，獨霸國處於相對優勢的權力分配地位，故而國際體系會迫使適當國家增加其相對權力，成為新興的強權，以避免被獨霸國吞併，也就是國際結構會迫使單極體系轉變為多極體系。^⑤華茲認為，在蘇聯終結後，國際體系走向單極體系，不過單極體系是國際體系中持續性最低的結構，因為獨霸國承擔過多的海外義務，最終會削弱獨霸國的能力；而且即使獨霸國展現出自制或是溫和的形象，弱國仍會擔心獨霸國的未來行為，尤其單極體系中獨霸國所擁有的不對稱權力，更會令小國憂慮大國的行為，小國或是會增強本國的權力，或是會採用結盟的手段，以確保本國的安全與生存。^⑥華茲更舉證哈布斯王朝（habsburg）、法國路易十四世與拿破崙，以及德國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與希特勒的歷史下場作為佐證，強調單極體系必然會因為國際無政府狀態產生的權力平衡作用，最終轉變為多極體系。^⑦

註^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hapter 4 and 5; Jack Snyder, *Myth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1~39;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21.

註^③ 抱持種想法的學者，以華茲、萊恩(Christophe Layne)及麥斯海默為代表，請參考 Christophe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and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註^④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註^⑤ Christophe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p. 12.

註^⑥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p. 28.

註^⑦ *Ibid.*

其次，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結構所形成的社會化作用，會促使所有國家具有相似性的作為。獨霸國稱霸的過程會帶給其他國家一個榜樣，誘使其他國家模仿獨霸國的行為，國家競爭關係及國際結構將產生結構內競爭者的類似傾向，各國均競相增強本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發展科技、組建更有效率的政府組織，以求在無政府結構下更具有生存的競爭力。[◎]總括而言，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本身，就是阻止單極體系發生的因素，因為在獨霸國成長之前，其他國家會結盟採取權力平衡策略去阻止獨霸國的成形，即使單極體系暫時生成，在國際體系的約制下，獨霸國亦不可能長期地存在。

華茲等新現實主義論者從國際政治的體系分析層次出發，聲言單極的不對稱權力分配情況，難以違逆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作用，最終一定會轉變為多極體系。不過這種解釋的解釋力並不充份，第一，新現實主義提出單極體系解體的原因，但是並沒有說明在何種情況下，這些因素會產生崩解單極體系的決定性作用。華茲曾預言兩極體系是最穩定的國際體系，但是兩極體系也維持不過四十餘年，他揭示穩固兩極體系之結構性因素，正是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平衡作用，但是顯然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平衡並沒有產生維繫兩極體系的作用，華茲強調這些相同的因素會產生崩解單極體系的作用，實在很難令人信服。中華文明的戰國時代就是一個標準的多極體系，不過其結局竟是以單極體系收場，所謂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平衡效應，似乎都沒有發生作用，吾人很難以華茲的說詞解釋此種發展。

第二，單純地強調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平衡作用會結束某一種國際體系結構，意謂國際政治中僅有一種而且不可動搖的無政府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並非單一性而是具有多樣性。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就指出，不同的概念形成三種不同的國際無政府狀態；首先是霍布斯式（Hobbesian）的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互相敵視、互相競爭，也就是新現實主義所認定的無政府狀態；第二種是國家之間互相競爭卻相互承認彼此生存的洛克式（Lockean）無政府狀態；最後是國家相互合作的康德式（Kantian）無政府狀態；處於不同類型的無政府狀態體系中，會有不同的國家行為。[◎]即使是處於最絕對的霍布斯式無政府狀態，東亞一再發生的單極體系現象就已經證明，多極體系在不確保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其最終的結局是單極體系而不是多極互相制衡。而且單極的權力分配情況處於不同內涵的無政府狀態中，體系的作用可能會大不相同，單極體系亦會有不同的結局。多極體系是否為單極體系不可規避的終點，在沒有更多實證分析前，如果驟下斷語，可能失之審慎。

最後，單極體系的穩定性似乎並不是如此脆弱。因為單極體系本身就是一種國際權力分配的結構，體系內不對稱的權力分配，是單極體系的最顯著特徵，而且這種極端不對稱的權力分配狀態，產生結構性作用，進而約制了權力平衡狀態的發生。伍佛

^{註◎} Christophe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pp. 15~16.

^{註◎}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15~312.

斯認為，單極體系的獨霸國具有不對稱的優勢地位，次級國家即使組成同盟亦無法對抗獨霸國，所以新興國家無法降低發動戰爭以取代獨霸國的成本，使得新興國家缺乏發動戰爭以取代獨霸國的動機，故而不對稱的國際權力分配，一方面使得強權國家間的戰爭可能性下降，更因為任何型式的結合都無法撼動獨霸國的地位，破除了國家結盟的動因。^⑩相對地，不對稱的權力分配，不單使次級國家放棄了抗衡政策，更迫使這些國家只得採行扈從或是至少不與獨霸國為敵的政策，^⑪所以他推論單極體系不可能發生霸權戰爭，其他國家與獨霸國之間的戰爭可能性亦會大幅縮減，單極體系更具和平性。^⑫依附獨霸國成為短期內最符合國家利益的選項，權力平衡政策在單極體系內不符成本效益，因而根本不會發揮作用。獨霸國更因為享受單極體系內區域性權力平衡作用帶來的效益，降低新興區域強權挑戰獨霸國地位的可能性。支持單極體系具有持久性的論述認為，區域強權要崛起並進而挑戰全球性獨霸國的地位，並不如新現實主義所預測的容易，因為一個大國在躍昇為具備挑戰全球性獨霸國能力的區域性強權之前，必須先克服區域內其他國家的反制；區域內權力平衡的作用，反而並不容許區域性強權成長為具有挑戰獨霸國的能力與地位。^⑬

單極體系的生成與轉換問題，在參考各家的論點後，可以綜合為二種可能性，第一是如同霸權轉移論與權力轉移論的觀察，當國際體系呈現階級現象的特徵後，單極體系內僅發生獨霸國的更迭，而單極體系可能長期持續，也就是單極體系的舊獨霸國為另一個新興獨霸國所取代。目前全球歷史中曾發生多次區域性單極體系持續的例證，例如東亞的中華帝國及美洲大陸的美國獨霸現象，不過尚未發生全球性單極體系持續的現象。單極體系第二種轉換可能，是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權力平衡作用，使得單極體系轉換為多極體系，在歐洲曾一再發生區域性單極體系瞬間就轉換為多極體系的歷史例證，不過亦沒有全球性單極體系曾被多極體系取代的歷史。至於單極體系轉換為兩極體系的可能雖亦不能被排除，不過在歷史上尚未發生類似的情況，而且國際關係理論也沒有對這種變化提出理論的探索。

伍、當前國際體系：以美國為例

二十世紀中葉起，國際關係投注主要的心力於描述、解釋與分析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1991年蘇聯正式解體，兩極體系亦隨之結束，總結當今美國在軍事、經濟、科技與制度等層次擁有超出主要國家能力的事實，證明現今的國際體系是一個單極體系。

註^⑩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 24~27.

註^⑪ *Ibid.*, p. 25.

註^⑫ *Ibid.*, pp. 23~28.

註^⑬ *Ibid.*, pp. 30~32.

表三 世界軍費支出前十五國（2003年）

依市場匯率換算數額排行					依購買力排行		
排名	國家	數額 (10 億美元) *	人均支出 (美元)	佔全球比 重(%)	排名	國家	數額 (10 億美元)
1	美國	417.4	1419	47	1	美國	417.4
2	日本	46.9	367	5	2	中共	151.0
3	英國	37.1	627	4	3	印度	64.0
4	法國	35.0	583	4	4	俄羅斯	63.2
5	中共	32.8	25	4	5	法國	38.4
6	德國	27.2	329	3	6	英國	35.0
7	義大利	20.8	362	2	7	日本	32.8
8	伊朗	19.2	279	2	8	德國	30.4
9	沙烏地	19.1	789	2	9	義大利	26.4
10	南韓	13.9	292	1	10	沙烏地	25.6
11	俄羅斯	13.0	91	1	11	南韓	25.0
12	印度	12.4	12	1	12	伊朗	23.7
13	以色列	10.0	1551	1	13	土耳其	22.5
14	土耳其	9.9	139	1	14	巴西	21.0
15	巴西	9.2	51	1	15	巴基斯坦	15.0
全球總額		878		100			

註：* 以 2000 年美元物價與匯率為基準進行換算後結果。

資料來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rter 10.4.

首先，美國享有難以抗衡的軍事優勢。一國的軍事力量除了要考量人數、火力、武器裝備的精良與武力的投射力量外，更因為其戰略、用兵準則及謀略的運用而會產生不同的作戰效力。從軍事支出與軍隊的規模估算各國的軍事實力，是最簡單的方式，因為軍事支出與軍隊規模的多寡，可以一窺國家投注在軍事領域資源的大小及決心，更可以推測出武器裝備及後勤支援的精良程度，呈現國家維持武裝力量保障國家安全的能力。美國是全球軍費支出的第一大國，2003 年美國軍費支出佔全球軍事支出的 47%，超出日本、英國、法國與中共軍費支出總和 25 個百分點，全球軍費支出幾乎有一半是美國所花費。^④國際社會已經長期沒有發生強權國家間的軍事衝突，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除非運用單極體系的概念，否則很難解釋為何僅有美國持續投注大量的資源到軍事領域，其他國家的軍費成長速度卻遠遠遜色，而且安於美國領先的狀態。

註④ 請參考表三。

表四 全球軍隊規模排行（2003年）

排行	國家	人數 (單位：萬)	佔全球軍隊人數比例 (%)	單位官兵軍費投資 (單位：人／萬美元)
1	中共	225.0	11.05	1.45
2	美國	142.7	7.00	29.25
3	印度	132.5	6.50	0.93
4	北韓	108.2	5.31	0.16
5	俄羅斯	96.0	4.71	1.35
6	南韓	68.6	3.36	2.02
7	巴基斯坦	62.0	3.04	0.54
8	伊朗	54.0	2.65	3.55
9	土耳其	51.4	2.52	1.92
10	緬甸	48.8	2.39	1.27*
11	越南	48.4	2.37	0.66*
12	埃及	45.0	2.21	0.37*
13	敘利亞	31.9	1.56	1.85
14	泰國	31.4	1.54	0.58
15	印尼	30.2	1.48	0.69*
16	烏克蘭	29.5	1.44	0.40
17	台灣	29.0	1.42	2.50
18	德國	28.4	1.39	9.57
19	法國	25.9	1.27	13.51
20	日本	23.9	1.17	19.62
全球		2035.8	100.0	4.31

註：*軍事支出數額依據2003年該國公佈預算換算美元，其數額依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4-200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04)。

資料來源：軍隊人數依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4-200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04)，軍事支出數額以2000年美元物價與匯率為基準進行換算後結果，依據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4*, Appendix 10A。

以軍隊規模計算，美國雖僅次於中共，擁有全球第二大的軍隊數額，不過透過單位官兵所分配的軍事支出數額，可以觀察到美國投資每位官兵將近30萬美元，而中共僅約有1.4萬美元。^⑥兩相比較，可以觀察到美國的軍事力量擁有其他國家難望其項

註^⑥ 請參考表四。

背的精密裝備、後勤支援及官兵福利。美國在歐洲、東亞暨中東地區各部署了十餘萬陸海空軍，此外更透過各種不同類型的軍事協定，享有使用各主要國家軍事基地的權利，強化了美軍在全球部署與作戰的能力。相較之下，中共、俄羅斯、法國與美國的盟邦英日等國，就不具備全球性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能力。俄羅斯、英國、法國、中共、巴基斯坦與印度等國家，都擁有核子武器，更是重要的區域性強權，不過其軍事能力的總和尚無力與美國匹敵，依據目前各國所投注在軍事領域的資源比重，更難以扭轉美國所具有的軍事優勢。同時美國已開始發展與初步部署反彈道飛彈系統，如果此種系統能夠有效運作，將可以大幅降低其他國家對美國發動核武攻擊的有效性，甚至美國的核武戰力可能已經打破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嚇阻效應，擁有主動對俄羅斯及中共發動核武第一擊（first strike），且運用戰略防禦系統抵消中、俄等國核武反擊殺傷的絕對優勢。^⑯

表五 世界 GDP 前十強及百分比例表（2004 年）

總額				購買力			
排名	國家	GDP (單位：百萬美元)	佔世界百分比 (%)	排名	國家	GDP-PPP (單位：百萬美元)	佔世界百分比 (%)
	全球	40,887,837	100			55,938,191	100
1	美國	11,667,515	28.53	1	美國	11,628,083	20.78
2	日本	4,623,398	11.30	2	中共	7,123,712	12.73
3	德國	2,714,418	6.66	3	日本	3,774,086	6.74
4	英國	2,140,898	5.23	4	印度	3,362,960	6.01
5	法國	2,002,582	4.89	5	德國	2,325,828	4.15
6	義大利	1,672,329	4.08	6	英國	1,832,252	3.27
7	中共	1,649,329	4.03	7	法國	1,744,352	3.11
8	西班牙	991,442	2.42	8	義大利	1,621,372	2.89
9	加拿大	979,764	2.39	9	巴西	1,482,859	2.65
10	印度	691,876	1.69	10	俄羅斯	1,408,603	2.51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 July 2005,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STATISTICS/Resources/GDP.pdf>(viewed 2005/11/02)

在國際體系中，相對於其他國家，生產愈多產品之國家，擁有愈多的資源，處理及解決其所面對的問題；^⑰當某國內部市場愈大，其政府封閉或是開放其市場給外國

註^⑯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Rise of U. S. Nuclear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2006), pp. 42~54.

註^⑰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56.

進口產品的自由度也就愈高，進而其潛在的經濟權力也就愈大。^⑧相對而言，美國的確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多的經濟籌碼，去維持優勢的軍事領先地位。2004年全球經濟資源分配，美國佔全球GDP的28.53%，是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國的總和，美國GDP數額超出第二位日本的一倍以上，更是中共的七倍。^⑨美國更是全球主要商品貿易的進出口國，它佔全球商品貿易出口值的9.6%，進口值的16.8%，美國的進口商品總值，是德國、中共與英國進口數額的總和，呈現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市場的重要性。^⑩日本經濟產業省就分析指出，目前東亞國家採取外銷導向的發展方式，仍主要仰賴美國單一市場所提供的成長動力。^⑪

第二，美國的經濟規模與地位不但領先他國，在科技研發與創新的腳步，亦是獨步全球。美國2004年對研發的投資金額超過2,900億美元，是全球研發投資第二名的日本之兩倍，而且2002年的統計顯示，美國投注在研發的金額超過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及英國的總和。^⑫美國發表的科技期刊數量及被引用率，贏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科學家數目，都領先全球其他國家，而且美國在全球高科技產品的比重都超過三分之一，亦處於大幅領先的地位。^⑬統計2004年各領域期刊的文章刊登篇數及被引用率發現，美國在文章發表篇數及文章被引用率兩項都獨佔鰲頭，其中文章發表數為3,321萬餘篇，第二名的英國僅有637萬餘篇，其次為德國、日本、法國、加拿大、義大利、荷蘭、瑞士與澳洲等國，中共位列全球科技文章發表篇數排行榜的第18名，不到80萬篇；而美國被引用率為269萬餘次，第二名是日本，被引用率為72萬餘次，其後為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義大利、俄國，中共排名被引用率的第九位，被引用次數為27萬餘次，第十名為西班牙，台灣位居被引用排行榜的第20名，被引用次數為九萬八千餘次，略遜於巴西及波蘭。^⑭若分析全球期刊文章最常被引用的前30%科學家所處的地域，發現這些最常被引用的1,222位科學家，分屬27個國家的429個研究機構，這些機構中再依最常被引用科學家的工作人數排序，顯示前20所擁有最多科研菁英的研究機構中，有18所位於美國，僅有2所地處英國。^⑮更有研究以為，美國自由放任式(*laissez-faire*)的政治意識形態及自由分權式的國家結構，比日本等採用國家官僚規劃的產業發展策略，擁有更高的科技創新成就，而且能夠長

^{註⑧}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 33.

^{註⑨} 請參考表五。

^{註⑩}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WTO, 2004), Table 1.5.

^{註⑪} 經濟產業省，2005年度通商白皮書(東京：經濟產業省，2005年)，頁52。

^{註⑫} Adam Segal, "Is America Loosing its Edge?"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6 (2004), p. 3.

^{註⑬} Robert L. Paarlberg, "Knowledge as Power: Science, Military Dominance, and U. S.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1 (2004), pp. 127~128.

^{註⑭} In-Cites, "The Year 2004: Top 20 Country Rankings in All Fields," <http://www.in-cites.com/countries/2004allfields.htm>, 2004. Viewed 2005/11/02.

^{註⑮} Michael Batty, "Commentaries: The Geography of Scientific Cit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 35, No. 5 (2003), pp. 761~762.

期維持科技發展的領先地位。^⑧美國在科技研發與創新商業化的領先地位，成為美國保有軍事及經濟優勢的重要助力。

第三，美國創造了一個以國際制度等軟權力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此種由美國所創建的國際秩序，其特徵主要表現於：美國運用其軍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市場的掌控及美元所扮演的國際性角色，所共同展現的全球主宰地位；以及美國被太平洋及大西洋所隔阻的獨特地理位置；民主與國際制度使美國不易受到其他國家的威脅；還有美國的多元文化認同及現代化的成就，提供美國享有對全球政治發展的絕大影響力。^⑨奈依（Joseph S. Nye）雖然一再警世美國不應高傲自大，更強調美國在資訊時代及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挑戰，不過他亦在列舉各時代優勢領先國的權力資源後承認，美國在21世紀的主要權力資源，在於科技的領導地位、軍事與經濟的規模、軟權力及作為跨國通訊的樞紐地位（hub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s）。^⑩他一再念茲在茲的警語，是希望美國要善用手中的硬權力與軟權力，營造一個美國永遠位居領導地位的國際格局。

第四，目前的國際社會並沒有出現抗衡美國獨霸的軍事聯盟，更沒有發生全球性權力平衡的現象。^⑪在衆多可能挑戰美國獨霸地位的候選國中，歐盟與中共是最受人注目的國家與地區。但是歐盟是否能整體地作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單元，並且擁有軍事、經濟等各種國家權力的加總，仍有待商榷；而且2005年歐盟憲法在歐盟會員國間進行公民投票的認可程度並不高，為歐盟的進一步整合投下了陰影。在一定的時間內，歐盟要成為美國有力的競爭者並不樂觀。中共近年來的經貿發展成就雖然令人側目，追求軍事現代化的腳步更日趨明顯，不過仍與美國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即使中共的軍事支出數額如美國所估算的接近900億美元，仍僅有美國軍事支出的四分之一，^⑫中共的軍事實力仍與美國有極大的落差。再者，中共至今仍無法自行設計與生產先進武器裝備，例如中共從俄羅斯進口Su-27型戰機、基洛級（Kilo Class）潛艦、現代級（Sovremenny Class）驅逐艦及S-300PMU型防空飛彈，都證明中共不具備生產先進武器系統的能力。回顧國際關係的霸權更替，顯然沒有任何一個崛起強權能夠在軍事科技極端落後的情況下，以進口先進武器贏得霸權戰爭。

^{註⑧} Daniel Drezner, "State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1 (2001), pp. 3~25.

^{註⑨} John G.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01), pp. 193~211.

^{註⑩}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

^{註⑪} 請參考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2~108; and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109~139.

^{註⑫}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p. 22.

最後，美國各種單邊行為雖招致衆多輿論的指責，但這些聲浪並未能匯集為反對美國獨霸地位的軍事聯盟，更沒有改變美國的行為。2003年美國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單方面地解釋聯合國決議案所賦予的行動正當性，以武力進攻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並且在美國軍事佔領的情況下，扶植一個伊拉克臨時執政當局。美國的作為雖招致中共、法國、俄羅斯與德國的堅決反對，但是法國、德國與俄羅斯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改變美國的政策，而且英國、西班牙、東歐諸國、日本、南韓等合計四十餘國政府，無視內部的強大反對聲浪，都堅決地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的行為。美國小布希政府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與退出1972年反彈道飛彈（ABM）協議，更被視為美國蠻橫的代表，這些事件更傷害美國行使權力的正當性與美國霸權的善意面貌。^⑩不過這些事件都沒有促使其他次級國家組成反對美國的軍事聯盟，反而被迫忍受美國的諸般單邊主義作為。這些事證，無異為現今單極體系的運作及特徵，提供了一個最佳的例證。

陸、結論

從國際權力分配的情勢角度分析，當今國際體系呈現單極的局面，美國位居國際權力分配金字塔的最頂端，其他個別國家，或是不具備挑戰美國獨霸地位的能力，或是沒有顯示挑戰美國獨霸地位的意圖。次級國家的行為受制於單極體系的結構性不對稱權力分配，傾向於扈從美國領導或是默許美國採行單邊主義的政策，這些國家無法有力糾正美國的作為，亦難以明顯地改變美國所採行的政策。

不過吾人亦不能忽視單極體系中獨霸國所提供的正面特徵，也就是美國運用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同時亦成為一個國際制度的創建者與穩定者。單極體系下，由於獨霸國擁有相對優勢的權力，所以得以成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任何可能危害獨霸國利益與國際秩序的紛爭與衝突，都會受到獨霸國的干預，所以國際失序的可能性大幅降低。次級國家之間的衝突與戰爭，由於不可避免地會傷害到區域穩定與影響到國際的權力分配，獨霸國必須進行調處，避免事態的擴大，傷及獨霸國的優勢地位。

在維持獨霸國的優勢地位考量下，獨霸國成為國際現狀的最有力維持者，獨霸國不容許國際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走向不利於獨霸國優越地位的方向。另一方面，次級國家或許須付出很大的代價，才得以挑戰或是改變獨霸國的地位，但是次級國家亦可能會甘於臣服在獨霸國所創造的國際制度現狀，轉而尋求成為區域性霸權，但是不與全球性的獨霸國相抗衡。

綜觀當今對單極體系的描述，雖然對單極體系的可能轉變有不同的預測與觀察，但是各種解釋都不否認現今國際的權力分配情況，呈現出向單一國家集中的局面。認為單極權力分配不過是一個暫時現象的分析，雖強調單極體系難以逃脫的崩解，但是

^{註⑩} Evelyn Goh, "Hegemonic Constraints: the Implications of 11 September for American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7, No. 1 (2003), pp. 80~89.

亦無法提出一個明確的時間表。接受單極體系不能長期存在的假設之餘，美國的學者甚至提出諸多建議，企求能夠延緩美國獨霸地位的衰落，或是認為應未雨綢繆，因應未來的多極體系中美國的國家利益。^⑫總體而言，當前美國仍將維持其獨霸的地位，但面對中共可能的挑戰，美國與中共在未來 20 年的互動結果，將決定未來國際體系的走向。^⑬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身為獨霸國的美國，在單極體系的約制下，很難坐視中共取代美國的優勢地位，而且中共要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性的獨霸地位，更須付出極大的代價，方能夠克竟其功。

* * *

(收件：94年8月12日，複審：94年11月7日，接受：94年12月19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⑫}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and 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1998), pp. 40~79.

^{註⑬} 有關美國看待中共崛起的討論，請參考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Michael E. Brown ed.,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 The MIT Press, 2000);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5~40. 有關中共是否為一個現狀國家的討論，請參考 Alastair Ia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有關中共崛起與美國維持東亞穩定的討論，請參考 Barry Buz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The Interplay of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2003), pp. 143~173; and Robert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81~118.

The Birth, Per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polar System

Hsin-chih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terminated the bipola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owe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still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distribution after the bipolar system. Neorealists thought that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uld bring the world into a multipolar system. They insist that nowadays, the unipolar moment is just a transitional period toward a multipolar system.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we are in a typical unipolar system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only hegemony.

In an unipolar system, the hegemony will strive to maintain power supremacy relative to other actors, limiting policy choices to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The termination of the unipolarity could be either the rise of revisionist states or the decay of the hegemon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must mee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unipolarity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theoretic interpretations, explanations, and predictions.

Keywords: unipolar system; polarity; hegemony; balance of power; bandwagon; hierarchy



參 考 文 獻

孟子，《孟子》，梁惠王篇上。

經濟產業省（2005），《2005 年度通商白書》，東京：經濟產業省。

- Baldwin, David A. (1979),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 31: 2, 161-194.
- Barnett, Michael and Raymond Duvall (2005),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1, 39-75.
- Batty, Michael (2003), "Commentaries: The Geography of Scientific Cit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5: 5, 761-770.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5),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 72-108.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2003),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The Interplay of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The Pacific Review*, 16: 2, 143-173.
- Chan, Steve (2004),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13:3, 103-141.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1),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4, 5-40.
- Deutsch, Karl W. J. and David Singer (1964),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16: 3, 390-406.
- Drezner, Daniel (2001), "State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1, 3-25.
- Dunne, Tim (2003),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3, 303-320.
- Fairbank, John K. (1968),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h, Evelyn (2003), "Hegemonic Constraints: the Implications of 11 September for American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7: 1, 77-97.
- Haas, Robert M. (1970), "International Subsystems: Stability and Pol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1, 98-123.

- Hart, Jeffrey (1976),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0: 2, 289-305.
- Hobson, John M. and J. C. Sharman (2005),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1, 63-98.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 2, 35-49.
- Iain Johnston, Alastair and Robert S. Ross, eds. (1999),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Iain Johnston, Alastair (2003),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56.
- Ikenberry, G. John (1999),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3, 43-78.
- Ikenberry, G. John (2001),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5, 191-212.
- In-cites (2004), "The Year 2004: Top 20 Country Rankings in All Fields," <http://www.in-cites.com/countries/2004allfields.html> (2005/11/02)
- Ingduchi, Takashi and Paul Bacon (2005), "Empire, Hierarchy, and Hegemony: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5: 2, 117-132.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4),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4-200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03),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3, 165-180.
- Kaplan, Morton A. (1957), "Balance of Power, Bipolarity and Other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 3, 684-695.
- Kaplan, Morton A.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Keohane, Robert O. (1980),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31-162.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3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ugler, Jacek and A. F. K. Organski (1989),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 Boston: Unwin Hyman, 171-194.
- Kupchan, Charles A. (1998),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2, 40-79.
- Kupchan, Charles A. (2002), *The End of American Era: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Lake, David A. (1996),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1, 1-33.
- Lake, David A. (2003),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 3, 303-323.
- Layne, C.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4, 5-51.
- Lieber, Keir A. and Daryl G. Press (2006), "The Rise of U. S. Nuclear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85: 2, 42-54.
- Lieber, Keir A. and Gerard Alexander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 109-139.
- Levy, Jack S. (1987),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 1, 82-107.
- Mastanduno, M. (1997),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4, 49-88.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Nye, Joseph S.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arlberg, Robert L. (2004), "Knowledge as Power: Science, Military Dominance, and U. S.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1, 122-151.
-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2, 251-267.
- Rosecrance, R. N. (1966),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the Futur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 3, 314-327.
- Ross, Robert (1999),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81-118.
- Segal, Adam (2004), "Is America Loosing its Edge?" *Foreign Affairs*, 83: 6, 2-8.
- Snyder, Jack (1991), *Myth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SIPRI Yearbook 200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mmen, Ronald 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 Stephen M. (1991), "Alliance Formation in Southwest Asia: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Cold War Competition,"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1-84.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altz, Kenneth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1, 5-41.
- Wayman, Frank W. (1984), "Bipolarity and War: The Role of Capability Concentration and Alliance Patterns among Major Powers, 1816-196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 1, 61-78.
- Wendt, Alexander and Daniel Friedheim (1995),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4, 689-721.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kinson, David (1999), "Unipolarity Without Hegemony,"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 2, 141-172.
- Wohlforth, William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5-41.
- Wohlforth, William C. (2002), "Hierarchy, Status and War," paper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Ma., August 29-September 1, 2002.
- World Bank (200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 World Bank,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query/>(2005/11/02).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WTO,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4_e/its2004_e.pdf.

